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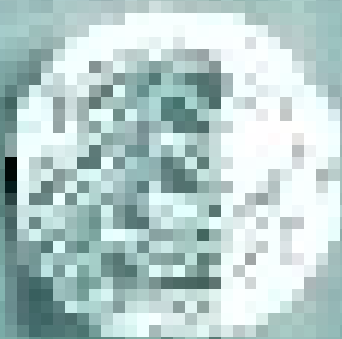
先秦儒家修辭要論

池昌海 著



中華書局

先驅者或探險者



！

！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中華書局

先秦儒家修辭要論



池昌海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先秦儒家修辭要論 / 池昌海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2.1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101- 08359 - 0

I. 先… II. 池… III. 儒家 - 修辭學 - 研究
- 中國 - 先秦時代 IV. H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1)第 235617 號

-
- 書 名 先秦儒家修辭要論
著 者 池昌海
叢 書 名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2 插頁 2 字數 35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08359 - 0
定 價 68.00 元
-

“漢語史研究叢書”總序

浙江大學的漢語史研究中心是1999年成立的,已經近十年了,而可追溯的漢語史研究的歷史則相當久遠。中心的大部分成員1998年以前屬於杭州大學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而古漢語研究一直是杭大中文系的優長學科,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杭州大學中文系的前身是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0年成立)和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8年成立)。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學者張相、馬敘倫、任銘善、蔣禮鴻等先生先後在兩校任教,開創了我校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領域,筭路藍縷,功不可沒。

1952年,由浙江大學分出的師範學院、文學院和理學院的一部分與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合併,組建了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浙江師範學院與新成立的杭州大學合併,定名為杭州大學。1961年,在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聚集了一批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各擅勝場,成果迭出,如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楚辭通故》,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義府續貂》,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等,都是名聞遐邇的力作,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隨着“文革”的結束,學術事業中興,杭州大學中文系的漢語史研究興旺發達,生機勃勃。老一輩學者姜亮夫、蔣禮鴻先生等老當益壯,中青年學者郭在貽教授等脫穎而出,在楚辭學、敦煌語言文字學、俗語詞研究等領域成就斐然,享譽海內外。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增設杭州大學漢語史專業為博士點,蔣禮鴻和郭在貽兩位先生被評定為博士生導師。此後,祝鴻熹、黃金貴教授相繼增列為博士生導師,一批年輕的博士先後加盟。漢語史研究成為杭州大學最具特色的學科之一,人才濟濟。姜、蔣、郭等前輩學者不僅自己辛勤耕耘,成果豐碩,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承擔了教書育人的重任,培養了一大批有潛力的年輕學子,目前活躍在漢語史學界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治中古漢語的王雲路、方一新、顏洽茂、梁曉虹,治近代漢語(敦煌語言文字學)的張涌泉、黃征、蔣冀騁,治文字訓詁的傅傑、殷寄明、任繼昉等,都出自幾位先生的門下。

1998年9月,在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四校的基礎上合併組建了新浙江大學。以中文系古漢語、現代漢語兩個教研室為基礎,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言研究所。1999年10月,以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為主體,聯合古籍所等單位,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漢語史研究中心正式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心依託浙江省重點學科漢語言文字學、全國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及博士後流動站,側重於中古漢語、近代漢語及訓詁文字學研究,特色鮮明,隊伍整齊。

漢語史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業。通過漢語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對漢語的發展歷史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洞悉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還能夠幫助解決中國古代文史哲等相關學科中存在的有關語言文字方面的許多實際問題,更好地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

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科研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以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為紐帶,展開學術研究。迄今為止,已經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4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6項,還有多項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資助項目等課題研究。為了體現出成果、出人才的基地建設宗旨,展示中心成員在漢語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我們打算從今年起,在三五年內,陸續出版一套“漢語史研究叢書”,計劃共出三輯,每輯6-7種,共約20種,分批推出。列入本套叢書的,主要是中心研究人員的學術專著,也有幾篇較為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後出站報告,這些博士論文或出站報告,都經過了學界同行專家的匿名評審並得到了較高的評價。叢書內容包括方言、語音、語法、詞彙訓詁等漢語史研究的相關領域。這些著作,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漢語史研究中心專職人員的整體力量,其中,年輕一代的成果,尤其值得關注。

應該說明的是,中心部分重大項目的最終成果,如《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古漢語詞彙史》、《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古代同義詞詞典》等已經或將要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中心部分成員的其他成果,也已列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出版,這些都不在本叢書的出版計劃之列。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能有幸入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發展到今天,飲水思源,應該歸功於老一輩學者為我們打下的良好基礎,歸功於給了我們許多支持和幫助的學界前輩;中華書局願意出版這套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學術著作,各位責編認真負責地幫助我們把關,令人感動。在此,謹對所有給予

漢語史研究中心及這套叢書各種關心支持的先生和朋友們，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當下社會，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高校也非世外桃源，急功近利的陰影始終不散，學術環境不如人意——這些都無庸諱言。但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無論世事如何變化，應始終保持內心的恬淡，不忘對學術的追求。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喧囂的塵世，中心的學術同人始終執着地做着教學、科研和培養人才的工作，默默耕耘，矢志不渝，這套叢書的出版就是很好的證明。在此，我要感謝中心的每一位老師，中心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大家的支持。當然，叢書肯定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盼望着得到學界方家的批評和指正。

方一新

2008年11月27日於浙大西溪校區

序 一

2005年某日我在一家書店的一長排書架前，仰觀諸書，歡喜愉悅，忽然頓悟：各類思想史的書籍耀現於前，琳琅滿目，如此之多，然而却缺我們這一學科的《中國語言學思想史》！怪也不怪？由此，在做了一段時間的調查、思考以後，我寫了篇文章，向學界揭出這個問題。我也企圖“不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探出個中緣由。當今“大勢”：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硬實力”很強，其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Soft Power)也變得比以往更爲突出。表現在語言學領域，美國步，中國亦步；美國趨，中國亦趨，只要美國語言學超市的貨架上有什麼貨色，中國就引進。大概在美國的貨架上沒見到《語言學思想史》，所以中國語言學市場就也不見《中國語言學思想史》^①。

近日，池昌海教授寄來了他的新著《先秦儒家修辭要論》的書稿。我打開拜讀，不由得不欣喜，這就是我所企盼多時的“中國語言學思想史”類的書啊！

何以如是說？

請看池著的上編“先秦儒家修辭思想”，內分四章，歷敘孔子、孟子、荀子、《周易》的修辭思想。每章復分爲兩節：如第一章“孔子的修辭思想”之下爲“孔子的普通修辭思想”和“孔子的儒學修辭思想”，其餘三章類推。請問，這不是語言學的分支學科修辭學思想史是什麼？池著講的是中國先秦時期的修辭思想，這不是語言學的斷代思想史是什麼？池著研究的是先秦儒家的修辭思想，這不是學派思想史是什麼？此處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部“語言學思想史”絕非從美國超市販來的，而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貨”，這一點可能不爲人所注意。也許著者本人未必充分意識到，這是我從近年關於語言學思想史的思考角度對這部書的“闡釋”。如果讀者諸君同意我的提法，那我要進一步說，凡是

^① 魯國堯《就獨獨缺〈中國語言學思想史〉!》，收入《語言學文集：考證、義理、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93頁。

自主創新，都應該受到表揚，池昌海教授的這部著作當然不應例外。

池昌海教授認為，中國古代修辭有其特有的價值和功能，應該立足于文化視野以開掘、探研中國先秦時期修辭的豐碩成果，從修辭思想和修辭行為兩個層面加以闡論。在此書上編，池昌海教授詳細而全面地梳理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或典籍關於修辭行為的性質、範圍、功能的論述，將這一思想劃分為普通修辭思想和儒學修辭思想。尤其是對後者的歸納和概括，第一次以系統的面貌展現於衆，揭示出儒家哲學思想在修辭思想中的表現，體現出孔子等聖賢將儒學思想與修辭觀點相互融合的文化精神，從此可知儒家哲學精神在修辭行為中的浸透以及將一切倫理化的執着。在儒家看來，修辭行為本身就是道德品質倫理意識的標誌。池昌海教授揭出這一屬性並詳盡深入地挖掘、歸納其表現和內在本質，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樣的研究有助於更深入地認識傳統修辭思想的文化內涵，瞭解我國修辭現象產生的哲學背景以及後來發展趨勢的原因。

池君這本書是修辭學專著。談到“修辭”，學人們自然會推溯詞源：古希臘文為 *rhētorikē*，拉丁文為 *rhētoric*，英文為 *rhetoric*，傳到東方，在十九世紀。日本學者首先以中國經典《周易·文言》中“修辭立其誠”的“修辭”兩字來翻譯，接着中國學者從日本把“修辭”借到漢語中來。其實“修辭”二字，就我淺聞，宋人司馬光之前的理解和自司馬光起的解釋並不相同。《周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語，內有“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中“修辭”的解釋起初是“修理工教”。《周易》唐孔穎達疏：“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工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玄曰：“修其教令，立其誠。”宋胡瑗《周易口義》：“辭謂文教也，誠謂至誠也。”^①到了北宋後期，出現另一解釋。司馬光《溫公易說》：“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外修言辭，內推至誠，內外相應，令無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程頤《伊川易傳》釋為“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李衡《周易義海撮要》謂“忠信，行也；修辭，言也”。清初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載王恕語：“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如此之類，不勝枚舉，直至現當代，如今人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修辭即言語。”^②劉大鈞《周易經傳白話解》譯作“修飾言辭以樹立

① 今人仍有從此說者，如崔樞華《周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頁。

② 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頁。

誠意”^①。

在歐洲，修辭學源遠流長，成系統、有理論。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是一本經典著作。此外，羅念生先生為亞氏《修辭學》的中譯本所寫的“譯者導言”^②、劉亞猛的《西方修辭學史》^③、姚喜明的《西方修辭學簡史》^④，對西方修辭學的來龍去脈敘述和評論都很詳細。連現代的歐美學者都承認，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植根於東亞的中華文明有其獨特的悠久的傳統，漢語自然也有其修辭，中國自然也有其修辭學史。中國的修辭學和西方的修辭學各有千秋，有同處也有異處。例如現代英語的 rhetoric，既有“修辭”的意義，又有“過於雕琢、華而不實”之義，這引申義的源頭當與古希臘時代“智者”們的活動有關^⑤。而在漢語，提到“修辭”，決無貶義，甚至有令人欽羨的意味。周振甫、鄭子瑜、宗廷虎、袁暉、吳禮全等先生的多本《中國修辭學史》都有詳細的論述，我就不再饒舌了。在這兒只想議論池昌海教授書中所說的“修辭行爲”，這“修辭行爲”或許也可叫做“修辭實踐”吧。池君這部新著《先秦儒家修辭要論》的下編就是研究“修辭行爲”的，標題為“先秦儒家修辭行爲”。他擇取儒家兩部經典《詩經》和《春秋》做研究對象，首先探討的是詩經的“襯音”與“疊音”問題，之後是“賦”、“比”、“興”問題，繼而對“《春秋》筆法”作了深刻的分析。後二者為千百年來的文學學者和史學學者所熟知，可謂千古聚訟的老大難問題。池昌海教授仔細地分析了這些修辭現象的形式、構成特點與功能，並盡可能地揭示了它們與儒家精神的關聯。這不僅為“興”和“春秋筆法”提出了嶄新的解釋，而且這一角度的選擇相對於既有的修辭研究而言，確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池著以“先秦儒家修辭特點”縮結全書，對“先秦儒家修辭思想的特點”和“先秦儒家修辭行爲的特點”二者作了總結，新意迭現，令人敬佩。

我還認為，這本專著顯示了作者治學“多元”、“會通”的特色。近若干年，我提倡“文史語言學”。我認為，語言學人不可囿於自己的圈子，語言學置於學術和文化的大環境裏，不過“滄海之一粟”而已。只要不是甘居井底，躍上井

① 劉大鈞《周易經傳白話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7頁。

② 亞里斯多德《修辭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劉亞猛《西方修辭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

④ 姚喜明《西方修辭學簡史》，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⑤ 見羅念生譯亞里斯多德《修辭學》卷首的“譯者導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頁。又王煥生《古希臘羅馬散文概論》，收於羅念生編譯《希臘羅馬散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頁。

臺，就會豁然而知天地之大。當今語言學人的通病之一在就語言學而研語言學，可乎？不可，不可！我們中國語言學人應該持多元觀念，我們中國語言學應該走會通道路。四百年前大科學家徐光啟就說過：“欲求超勝，必先會通。”^①先賢之言，豈容輕忽^②？我讀了池君此著，覺得深合我心。他將語言學（修辭學）跟哲學（如《論語》、《孟子》、《荀子》、《周易》）、文學（如《詩經》）、史學（如《春秋》）會通，而成此書。換言之，此著所涉含四門大學科，須知後三學科，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比語言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我所知，池昌海教授曾著有《漢語研究新探》、《現代漢語語法修辭教程》、《〈史記〉同義詞研究》、《現代語言學導論》等書，於斯可見他的功底和素養，也可見他走的是兼古今、通中外的康衢！能不推許？

池昌海教授征戰多年，終成大功，如今奏捷，可喜可賀。池君春秋鼎盛，建功立業，正此時也。可否策馬加鞭，乘勝前進，移師他方？在此我願獻一策。欲問何策？中國學術的源或上游在先秦，最難治的一段亦在先秦，這是人所周知的。池君這本專著就是研究先秦儒家的修辭行為和修辭思想，可否在大功告成之時，立即劍指縱橫家的修辭行為和修辭思想？我的這一想法是受到這一段文字的啟發：“演說曾經在古希臘社會政治生活中起過重要作用，演說辭是古希臘散文的一個重要方面。”“演說的發展促進了演說理論的產生，使成爲一種專門學問，稱爲修辭學。修辭學闡述演說的立論和修辭的藝術。”^③在古希臘，政治演說、訴訟演說、典禮演說，三者都很盛行，因而促進了散文的繁榮和修辭的誕生。衆所周知，西方文化的兩個源頭，其一即希臘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淵源于先秦，戰國時代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游說、辯論之風盛行，當彼之時，衆多游士說客呼風喚雨、縱橫捭闔。他們穿梭于七國之間，游說於廟堂之上，取相印，飽私囊，而且使得國際形勢波譎雲詭、震動跌蕩。不僅職業的縱橫家如蘇秦、張儀之流擅長說辯，就是法家的“理論家”韓非也在《韓非子·說難》中對游說之難作出多種概括；儒家大師孟軻不也游說過魏惠王、齊宣王等顯赫一時的君主？《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

① 《曆書總目表》，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中華書局，1963年，第374頁。

② 《學思錄：說“文史語言學”》，《語言學文集：考證、義理、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96頁。又，第235—236頁。

③ 王煥生《古希臘羅馬散文概論》，見羅念生編譯《希臘羅馬散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頁、第7頁。

行,放淫辭。’”既然古希臘演說家的修辭可以得到充分的研究,那麼古中國的縱橫家和准縱橫家的修辭不也值得研究?所以我在此斗膽建議池昌海教授發動二次戰役,凱旋之後,再將中國先秦時代的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的修辭思想、修辭行爲做一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勒成一部囊括性的巨著,以弘揚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爲中國語言學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作出更大的貢獻!

南秀村人魯國堯於 2010 年 2 月

序 二

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池昌海教授來電，說他的《先秦儒家修辭要論》（以下簡稱《要論》）即將出版，希望我寫一篇序言。昌海君的碩士生導師倪寶元先生與我有着亦師亦友的關係。多年前，他當華東修辭學會會長時，我是副會長兼秘書長；他當《修辭學習》雜誌主編時，我是主持工作的副主編。倪先生是我所尊敬的長者，我們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從倪先生身上，我學到很多。昌海君有着從倪先生處繼承過來的衆多優點，是我交往較多的年輕朋友之一。春節期間，我得空通讀了他的書稿，深感這是一部新意迭出、特色鮮明，於多年積累基礎上精心寫成的力作。我樂於爲之序。

《要論》有着以下顯著特點：

（一）開拓性

《要論》具有開拓之處頗多，以下僅舉竊以爲比較突出的數處：

首先，《要論》率先將先秦儒家的修辭思想及其修辭行爲放置在同一本書里，分上下兩編加以探索，同時揭示兩者的關係，饒有新意。前者屬修辭學史範圍，後者屬修辭史範圍，此前的學者多半是分別寫論著進行探索的。《要論》挑選我國修辭理論與修辭行爲的源頭或源頭之一——先秦作爲探索的突破口，同時對兩者進行深入探索，開拓性顯而易見。例如，作者在第十章中指出：“儒家的修辭思想……，其核心却別具特色：濃厚的儒家價值觀念才是衡量修辭行爲動機和效果、修辭方式與目的等的根本標準。”將儒家修辭思想對其修辭行爲所起的主導作用，剖析得頗爲精當。不僅如此，在該章末尾，作者對孔子的“修辭思想與實踐的關係”，作了深入探討，得出了“適當的言辭方式、合適的修辭技巧，既是體現君子個人修養的重要因素，也是關係到社會風氣乃至國家管理的重要的文化成分”的結論，頗爲深刻。其次，率先將儒家修辭思想歸納爲兩個層面：普通修辭思想與儒家修辭思想分別論析。尤其是後者，不僅體

現了向哲學層面的深入、體現了儒家修辭思想價值的重要，而且彰顯了獨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修辭理論。必須指出，前若干年的修辭學史研究，包括拙著《漢語修辭學史綱》^①在內，雖然也揭示了先秦諸子的修辭理論具有言辭必須“緊密聯繫內容”的特點，強調修辭必須與道德修養、政治、外交及日常交際等因素相結合，但主要還僅僅停留在昌海指出的第一層面的研究上。昌海開掘的第二層面，即“儒家修辭思想層面”，通過梳理儒家倡導的“仁”、“義”、“禮”、“知”、“信”等與“言”、“辭”等密不可分的關係，讓讀者認識到我國“獨具特色的儒家修辭思想系統的內涵與價值”，這些看法是富有創意的。作者的以下見解十分可貴：如“在儒家哲學系統裏，修辭也不僅僅是運用語言的行為，而是帶有濃厚文化內涵的哲學系統的一部分”。^②又如：“孔子的修辭思想……更從哲學道德的層面給修辭灌注了特定的文化內涵。”^③這些認識的開拓價值顯而易見。昌海君還明確揭示了自己的寫作意圖：“期待能對這些儒家經典有更深入和準確的理解，為全面把握儒家修辭理論、實踐及儒家哲學思想的內涵乃至認識傳統文化的內核獻出自己的微薄之力。”^④應該說，作者重視探索“儒家哲學思想的內涵”及“傳統文化的內核”之舉措，在修辭學史上將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論》的各大部分均有新的開拓，以下僅舉幾例。

1.《要論》揭示了孔子“辭達”說、“辭巧”說與“文質彬彬”說存在辯證關係的邏輯背景。以往的修辭學史著，均對孔子以上幾種看似矛盾的學說作了介紹，雖亦指出其中存在“辯證關係”，但對其合理的邏輯背景，未作深入、具體的說明。《要論》彌補了這一不足，指出上述論說在以下框架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辭達”是修辭的基本或常規要求，“辭巧”則為更高或超常規層面的要求。而“文質彬彬”則兼及兩個層面上的更高原則：“質”作為表達內容，既指符號所表示的內容，也指與儒家倫理思想相關聯的價值觀念或準則；“文”作為表達形式，是實現“質”的手段。在“辭達”層面上，要遵照所指內容做到與形式的有機統一，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文辭”層面上則還要兼顧儒家倫理道德等準則。作者還強調，在“辭達”的基礎上，如果有助於實現儒家的倫理道德或理想，完全可以提倡“辭巧”、“佞”；反之，“辭”雖巧、佞，若是有害於上述根本，那麼寧可

① 易蒲、李金苓，《漢語修辭學史綱》，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 見本書第十章 10.1“先秦儒家修辭思想的特點”。

③ 見本書第一章末尾。

④ 見本書第十章 10.2“先秦儒家修辭行為的特點”。

有質而無文，所謂“君子義以為質”^①、“不知其仁，焉用佞”^②等表述，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闡述，比較透徹。

2. 在《詩經》與“賦、比、興”關係的部分，論析亦饒有新意。尤其是“興”，雖然經常受到經學家、文學家等的關注，但歷來對其形式特徵、判斷標準等問題的闡述，一直比較模糊，缺乏十分明確的方法，爭論不斷。《要論》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逐一分析《詩經》中的詩章，認為“興”是一種修辭或話語結構手段，它以“章”為單位，由“興體”和“應體”兩個結構塊和意義塊構成。“興體”一般為詩章的前兩句，目的在於開題或引導，其詩旨却是通過“應體”來表達。還指出“興體”與“應體”之間共有三種意義關聯，即“連興”、“喻興”和“隱興”。這就把“興”與“比”明確地區分開來，解決了《詩經》研究史上一直困擾着衆多學者的難題。關於“比”，《要論》指出，它雖亦以詩章為單位，但與“興”不同，其內部不可再切分為兩個結構塊，其詩旨也不在詩章內，而是與詩章表面意思構成隱喻關係的詩外意旨。總之，作者從修辭學視角對《詩經》這塊精美的文化瑰寶作了比較清晰的梳理，不僅使“賦、比、興”之間不再存在難以區分的糾葛，還對《毛傳》、《鄭箋》和《詩集傳》中的相關標識疏證失誤作了辨正，值得稱道。

3. 在“《春秋》筆法”部分，論析也很精彩。《要論》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更為合理的方法，從語言學角度描寫了“筆法”在詞語和句子兩個層面的重要表現，使“《春秋》筆法”不再是主要靠感覺來定性，而是確鑿的有規則表現的修辭手段。通過對這一存在爭議現象的有力廓清，為深入理解《春秋》這部儒家經典的深邃內涵與歷史價值，也提供了具體的幫助。

(二)系統性

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亦是《要論》的特點之一。

《要論》對孔子、孟子、荀子、《周易》等修辭思想的論析，均分別構成一定的系統。以前者為例，昌海君將先秦典籍中涉及到孔子的有關修辭的論述悉數網羅，並按照其修辭思想的內在邏輯進行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歸納，使得孔子的修辭思想不再是簡單的幾段語錄或觀點，而是由“普通修辭思想”和“儒家修辭思想”兩大部分構成的一個完整的系統。其中，“普通修辭思想”部分，如孔子在多個角度有關“言”、“辭”等的論述，雖為零珠碎玉，却被昌海君集中在一起，

① 《論語·衛靈公》。

② 《論語·公冶長》。

構成了一個系統；“儒家修辭思想”部分，孔子關於“仁”、“義”、“禮”、“忠”等十個與修辭有關視角的片段論述，也被用另一條線貫穿了起來，構成了另一個系統。其他如孟子、荀子、《周易》修辭觀的闡述也均體現了一定的系統性。在“修辭行爲”方面，也同樣如此。

（三）對語料採用了窮盡搜羅的等方法，有助於創新

《要論》對語料採用的窮盡搜羅、全面歸納、統計比對的研究方法，有助於創新和深入。

先看《要論》上編“先秦儒家修辭思想”。在對孔子、荀子、孟子等修辭思想進行歸納時，作者避免採取常用的簡單歸納、突出關鍵的方法，而是對傳世的先秦文獻進行窮盡搜羅。不管文字長短，也不論表面是否矛盾，均悉數搜羅，然後按照修辭思想的內在邏輯進行全面歸納，這樣就能保證所論的課題比較全面、比較徹底，也才能較為完整地展示修辭思想的體系。因此，目前擺在讀者面前的就不再是關鍵性的條例的概括，而是內容更為豐富的脈絡，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修辭思想從而能以立體豐滿的系統給世人更多的啟示。與此同時，採用這種方法，也有助於更客觀地面對事實、有助於更深入地勾勒出本質。如“普通修辭思想”部分，能更全面地歸納出先秦儒家對常規修辭行爲和原則等的論述；在“儒家修辭思想”部分，則便於更深入地揭示出儒家文化在修辭思想方面的表現。總之，上述窮盡歸納、系統總結的方法為探索的深化打下了基礎，部分研究成果得以在國內多家學術刊物上刊發或轉載，並得到學界的好評。

再看下編“先秦儒家修辭行爲”。《要論》針對研究歷史悠久但因惑也依舊的問題，在充分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沒有沿用傳統的路子，而是採取實證的方式，對修辭文本進行窮盡性的歸納和分析。同時採用統計和比對的方法，針對相對範圍內的材料進行探討，避免簡單歸納和感悟評價。如對《詩經》的襯音和疊音的修辭特徵與功能進行分析時，《要論》採用了逐詞分析統計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歸納總結。通過分析，全面描寫了這些語音修辭的種種表現，並運用數據證實了語音手段作為特徵標記與《詩經》題材風格之間存在着種種關聯，為“風、雅、頌”的分類提供了新的依據。又如對“《春秋》筆法”的分析，《要論》既未採用《公羊傳》、《穀梁傳》的點評方法，也未運用《春秋經傳集解》等注疏中的定性評價方法，同時也沒有沿用杜預在《春秋釋例》中的簡單歸納，而是結合《春秋》語體的特徵，從“詞語”和“句子”兩個層面，通過數據統計和比對的方式，形式化、窮盡性地歸納出重要“筆法”的種種類型，

第一次以語言學的方式規律性地展示出“《春秋》筆法”的形式與功能。又如在“異義述謂”中探討對周王、魯君(后)、魯臣的諱筆時,不僅全面描寫了正面的材料,也通過側面材料的比對,看出對其他諸侯國君的直述與貶義。另如“句義類型與稱謂變化”一節裏,作者通過統計發現在某一意義的句式中,對施事等語義成分選擇的不同與褒貶有着規律性的關聯,再運用對比相反情況加以對照,可以充分顯示這些“微言”及其蘊含的“大義”。通過這樣的工作,可以較大幅度地避免對同一個表達的認識所可能出現的見仁見智的情況。

二

《要論》爲什麼能做到新意迭出?竊以爲與作者本身的基礎、條件與努力分不開。

(一)功力頗深,識見卓越

昌海君先是師從原杭州大學著名修辭學家倪寶元先生、著名語法學家王維賢先生攻讀語法修辭專業的碩士學位,後又跟隨浙江大學名家黃金貴先生,成爲漢語史專業的博士生。因此,不論是現代漢語修辭、語法,還是古代漢語的漢語史,均經過名師嚴格的培訓。他不僅有扎實的修辭學基礎,還有雄厚的語言學特別是漢語史的基礎。他對先秦、兩漢的典籍尤爲鉅研、功力頗深。我早就拜讀過他的博士論文《〈史記〉同義詞研究》。正如《要論·後記》所述,從2000年起,作者先後發表過《孔子的修辭思想》、《〈周易〉的話語思想》、《孟子的修辭思想》等系列論文,承擔了浙江省文化研究重點項目《陳望道全集》的編纂等工作,這些均爲本書稿的撰寫,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看來,昌海君除了功力頗深外,在名家的點撥下,還做到了“識見卓越”。多年以來我的一個重要體會是:必須培養獨具識見,即特有的科研眼光的能力,其中首先遇到的即是善於抓選題。新穎的選題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要靠自己在熟讀前人著作基礎上悟出的獨特識見。昌海君正是在本書《後記》中說:“早在攻讀現代漢語語法修辭專業碩士畢業留校後不久,我就萌生了梳理我國早期修辭史和修辭思想史的想法,以圖更清楚地把握漢語修辭的發展脈絡,理解國人延續到現當代的修辭行爲和價值觀的淵源,也想爲深入認識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提供門徑。”他碩士畢業當在上一世紀90年代前期,當時我國已有好幾部修辭學史著問世,但修辭史還一片荒蕪,無人問津。在那時已經萌生出“梳理我國早期修辭史和修辭思想史的想法”,委實不易!我的